

21 世纪初 20 年我国教育学学科建设的回顾与展望

侯怀银

【摘要】 21 世纪初 20 年,我国教育学学科建设的进展主要体现在教育学学科群不断丰富完善、教育学元研究全面持续开展、教育学中国话语体系建设得到关注重视、教育学学科建设与时代发展得以紧密结合。我国教育学学科建设的特点在于重视处理教育学建设过程中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关系、教育学学科体系中各分支学科之间的关系、教育学知识生产质与量之间的关系以及教育学研究和教育研究之间的关系。展望未来我国教育学学科建设,教育学者尚需砥砺前行,不断实现教育学的学科自主、学科自立、学科自尊、学科自强、学科自信和学科自觉。

【关键词】 21 世纪初 20 年;中国教育学;学科建设

中国教育学在 20 世纪经历了发生、初建、重建、破坏、再建五个阶段。^①这为 21 世纪中国教育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积累了经验、提供了启示。21 世纪初 20 年,中国教育学者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为建设中国教育学贡献了智慧和力量。为深入推进中国教育学建设,我们有必要回顾 21 世纪初 20 年中国教育学学科建设的进展及其特点,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教育学的未来发展进行展望。

一、21 世纪初 20 年我国教育学学科建设的进展

21 世纪初 20 年,中国教育学学科建设取得的进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 教育学学科群不断丰富完善

我国教育学学科体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17 年,得到初步的建设和发展。但在“文革”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17 年教育学学科体系建设的成就被全部否定,教育学学科建设被迫中断,在学科体系发展史上形成了时空上的断裂。“文革”后,经过拨乱反正,我国教育学学科体系开始恢复重建,不仅恢复了教育学、教育心理学、教育史、各科教学法等“文革”前就有的学科,而且还提出要建设教

侯怀银,教育学博士,山西大学中国社会教育研究院院长、山西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太原 030006)。本文系 2021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重大课题“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体系发展与创新研究”(VAA210003)研究成果。

①侯怀银:《关于 20 世纪中国教育学史的思考》,《中国教育科学》2018 年第 1 期。

育哲学、比较教育、教育统计、教育行政、学校管理等 1949 年以前就已有的学科,进一步扩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17 年所建立起来的教育学学科体系。^①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教育学学科体系已具规模,初步形成了多种类型、互相关联、动态发展的学科格局,教育学科的各项功能呈加强趋势。

21 世纪初 20 年,教育学发展的一大表现是教育学一级学科不断分化,教育学学科群不断丰富。21 世纪以来,教育学在《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所公布的十个二级学科之外,又涌现出了诸多新兴的二级学科。^②就研究生教育学而言,20 世纪八九十年代,虽有研究者曾提出这一概念,但并未真正上升到一门学科的角度去研究,而 21 世纪初,伴随着一系列以“研究生教育学”命名的著作的出版,研究生教育学开始作为一门学科在我国出现。^③就教师教育学而言,20 世纪所称的“师范教育”在 21 世纪成为“教师教育”,这一变化从杂志名称的变更和学位点的设置可见一斑,如《高等师范教育研究》杂志已更名为《教师教育研究》;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四川师范大学等高校陆续设立教师教育方向博士点,成为我国教师教育学专业人才培养的重要阵地。^④此外,加快社会教育学学科建设的步伐也逐渐受到研究者的关注。^⑤

除新兴二级学科之外,原有的一些二级学科也分化出了新的研究方向。以教育学原理为例,本世纪初的 20 年,教育学原理学科已不再与教育基本理论、教育原理等混用,^⑥学科名称已稳定为“教育学原理”,其下不仅形成了如教育基本理论、教育哲学、德育原理、教育社会学、教育研究方法等研究方向,而且涌现出了如教育政策与法律、少儿组织与教育、学生发展、终身教育、家庭与社区教育等新的研究方向。此外,有的学者提出把原有的二级学科提升为一级学科。^{⑦⑧}

总体来讲,到 21 世纪初,教育学在中国已形成了一个以教育学一级学科为中心、科目门类多样、内容涵盖丰富、结构较为完整的学科体系,一个由近百门二、三级分支学科构成的丰富庞大的教育学学科群。这个学科群可以划分为以下四类:第一类是教育学自身分化、发展所形成的学科,即教育学专门学科,如教育学原理、教学论、课程论和德育原理等;第二类是教育学与相关教育领域结合所形成的教育学,如学前教育学、小学教育学、中学教育学、高等教育学、职业技术教育学、成人教育学、特殊教育学、家庭教育学和社会教育学等;第三类是教育学与相关学科交叉而形成的学科,即教育学交叉学科,如教育哲学、教育社会学、教育心理学、教育管理学、教育经济学和教育史学等;第四类是以教育学自身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如元教育学和教育学史等。

(二) 教育学元研究全面持续开展

教育学元研究的持续开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国教育学自我反思意识的逐步增强。21 世纪初 20 年,我国教育学元研究得以全面开展,所涉内容包括教育学的概念、性质、体系、功能和研究方法等。^⑨

在中国教育学建设过程中,国内研究者对教育学部分问题的讨论形成一些共识。如关于教育学的逻辑起点,研究者一般认为“育人”是教育学的逻辑起点;^⑩关于教育学的概念,研究者一般认为教

①侯怀银、刘光艳:《中国教育学学科体系的构建及其特征——以 20 世纪下半叶为中心》,《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 年第 2 期。

②侯怀银:《新中国成立以来教育学的发展历程及启示》,《中国教育科学》(中英文)2020 年第 2 期。

③侯怀银、王耀伟:《研究生教育学学科的研究:历程、进展和趋势》,《研究生教育研究》2018 年第 6 期。

④侯怀银、李秧:《教师教育学在中国:历程、进展和趋势》,《教师教育研究》2019 年第 6 期。

⑤侯怀银:《社会教育学学科建设初探》,《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0 年第 5 期。

⑥柳海民、邹红军:《教育学原理:历史性飞跃及其时代价值——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教育研究》2018 年第 7 期。

⑦刘小强:《关于建设高等教育学一级学科的思考》,《高等教育研究》2017 年第 1 期。

⑧张应强:《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学的危机与应对》,《高等教育研究》2017 年第 1 期。

⑨侯怀银、时益之:《我国教育学元研究的探索:历程、进展和趋势》,《中国教育月刊》2019 年第 12 期。

⑩侯怀银、时益之:《我国教育学元研究的探索:历程、进展和趋势》。

教育学是研究教育现象和教育问题,揭示教育规律的学科;关于教育学的研究对象,研究者一般认为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就是教育现象和教育问题;关于教育学的学科独立性问题,研究者一般认为教育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建设具有中国特色并走向世界的教育学成为21世纪以来中国教育学建设的新目标。^①

在中国教育学建设过程中,关于教育学性质的争鸣不断。有研究者提出教育学的学科性质应是研究教育艺术的科学,^②还有研究者认为教育学的性质就是“事理研究”性质。^③除此之外,研究者还对教育学到底属于社会科学还是人文科学进行了探索。有研究者认为教育学属于人文科学,^④有研究者认为教育学属于人文社会科学,^⑤也有研究者认为教育学是以人文学科为学科原点的社会科学,^⑥还有研究者认为教育学是一门研究教育现象的科学。^⑦纵观已有研究者对教育学性质的争论,基本上围绕教育学是不是科学,教育学是社会科学还是人文科学进行探讨。在争论的过程中,我们注意到研究者在研究教育学性质的过程中引出的两个问题,一是关于教育学的性质和教育学的学科性质的区分,其中学科性质是研究教育学的学科归属问题,不可等同于教育学的性质;二是关于教育学性质的研究意义,即探索教育学的性质能怎么样的问题。我们认为教育学的性质直接决定了教育学知识的生产方式,也可以说教育学知识的不同生产方式本身决定了教育学的性质。

21世纪初20年,国内研究者关于教育学的学科体系、教育学的逻辑起点等问题少有探索,但也有研究者对20世纪中国教育学的发展、^{⑧⑨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教育学的发展进行了系统研究,^⑪围绕20世纪以来中国教育学建设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⑫有的研究者提出要系统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学史,并主编了“共和国教育学70年”丛书12本,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很值得指出的是,在比较全国教育基本理论专业委员会自成立以来的历届学术研讨会的主题中,我们发现以“教育学元问题”为主题的会议已有四次(教育基本理论专业委员会自成立以来共召开了十七届学术年会),分别是1993年在四川大学召开的第四届学术年会,会议主题为“教育学研究的方法论”和“教育与市场经济”;2005年在内蒙古师范大学召开的第十届学术年会,会议主题为“教育学的学科立场”;2015年在山西大学召开的第十五届学术年会,会议主题为“教育的传统与变革”;2019年在湖南师范大学召开的第十七届学术年会,会议主题为“发现‘中国教育学’的‘文化逻辑’”。21世纪初20年就有三次。这三次学术会议的召开,进一步推进了教育学元研究的深入开展。

(三) 教育学中国话语体系建设得到关注重视

任何思想都需要用语言来表达。随着教育学“中国化”走向“中国教育学”,如何建设面向世界、扎根中国的教育学中国话语体系逐渐成为研究者广泛关注并深入探讨的话题。

教育学中国话语体系的构建有其必要性。有研究者提出构建教育学中国话语体系不仅是中国

①侯怀银、时益之:《我国教育学元研究的探索:历程、进展和趋势》。

②李宜江:《教育学是研究教育艺术的科学——对教育学学科性质的再思考》,《当代教育论坛》2013年第4期。

③卜玉华:《论教育学的“事理研究”性质》,《南京社会科学》2014年第2期。

④张楚廷:《教育学属于人文科学》,《教育研究》2011年第8期。

⑤王鉴、姜振军:《教育学属于人文社会科学》,《教育研究》2013年第4期。

⑥余小茅:《教育学:以人文学科为学科原点的社会科学》,《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

⑦周兴国:《论“教育学是一门研究教育现象的科学”》,《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⑧侯怀银:《20世纪上半叶教育学在中国引进的回顾与反思》,《教育研究》2001年第12期。

⑨侯怀银、杨琳:《20世纪下半叶教育学在中国引进的回顾与反思》,《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⑩柳海民、王晋:《20世纪中国教育学发展之镜鉴》,《教育理论与实践》2006年第21期。

⑪侯怀银:《新中国成立以来教育学的发展历程及启示》。

⑫金林祥:《20世纪中国教育学科的发展与反思》,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79-280页。

教育学发展的内在要求,而且也是改变中国教育学依附西方发展的面貌,推动中国教育学走向世界并发出中国声音的有效途径。^① 中国教育学话语体系构建中存在哪些问题,有研究者认为:“自身的文化立场不够鲜明、脱离实践、缺乏对个人体验和反思的关注、不加批判地‘接着说’等是我国教育学话语体系的顽疾。”^②还有研究者指出,新时期我国教育学话语在构建的过程中存在着失联、失语、失衡的“三失”问题。^③ 中国教育学的的话语体系如何建设,有研究者指出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教育实践中去构建中国教育学的的话语体系。^④ 还有研究者提出必须从教育问题出发去生成教育学话语。^⑤ 此外,为进一步推动教育学中国话语体系的建设,上海市社会科学界第十八届学术年会以“教育学的中国话语体系建构:问题与路径”为主题,对教育学的中国话语体系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与探讨。^⑥

重建当代中国教育学话语的典范当首推“生命·实践”教育学。华东师范大学叶澜教授首创并持续领导的“生命·实践”教育学在 21 世纪之前已走过了孕育期(1983—1991 年)、初创期(1991—1999 年),在 21 世纪则已走过了发展期(1999—2004 年)、成型期(2004—2009 年)以及渐至佳境的通化期(2009 年至今,尚在进行中)。叶澜教授认为“生命·实践”教育学是属人的、为人的、具有人的生命气息和实践泥土芳香的教育学。^⑦

(四) 教育学学科建设与时代发展得以紧密结合

21 世纪以来,我国教育学的建设始终与时代的发展同频共振,中国教育学在回应时代、诠释时代的同时,学科独立性得到进一步彰显,学科影响力得到进一步提升。

信息技术影响下的教育实践丰富了教育学的原创性理论成果,教育学迎来了逐渐摆脱依赖国外教育学输入的局面,走向了以我为主的生成之路。中国教育学的发展突出强调中国立场,教育学学派林立的局面渐次呈现。这种学科独立性体现出教育学学科发展中“自我意识”的增强。无论是社会以及技术等对教育学发展的影响,还是其他学科对教育学发展的影响,核心都是教育学人自我发展的结果。

教育学结合时代背景生成的学术理论,在丰富自身学术体系中解释并指导着中国教育改革实践。人工智能、脑科学等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成果被引入教育学领域,拓展了教育学的研究领域,加深了教育学的研究深度,使教育学研究者对学科知识系统内在逻辑的探寻、知识体系的搭建、研究结果的呈现形式都彰显出科学精神,凸显出了教育学的学术品质,提升了教育学的科学性内涵。^⑧

二、21 世纪初 20 年我国教育学学科建设的特点

21 世纪初 20 年,我国教育学学科建设已呈现出以下四个方面的特点:

①冯建军:《构建教育学的中国话语体系》,《高等教育研究》2015 年第 8 期。

②刘旭东:《我国教育学话语体系的反思与重构》,《中国教育学刊》2016 年第 7 期。

③赵梦雷:《面向新时代中国教育学话语及其体系重构》,《当代教育与文化》2020 年第 5 期。

④叶澜、罗雯瑶、庞庆举:《中国文化传统与教育学中国话语体系的建设——叶澜教授专访》,《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9 年第 3 期。

⑤李江源:《教育问题:教育学话语“生成”的起点》,《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 6 期。

⑥丁钢、侯怀银、谭维智、吴刚、黄忠敬、王保星、龙宝新、康永久、肖绍明、丁书林、李政涛:《教育学的中国话语体系建构:问题与路径》,《基础教育》2021 年第 1 期。

⑦叶澜:《“生命·实践”教育流派——在回归与突破中生成》,《教育学报》2013 年第 5 期。

⑧伍红林:《技术时代的教育学发展——兼议人工智能背景下教育学的两种可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9 年第 5 期。

（一）重视处理教育学建设过程中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关系

21 世纪初 20 年,由“教育学中国化”走向中国教育学并深入发展,是中国教育学学科建设取得的最大成就。

学科意义的教育学,对于中国来说是外来的,而非内生的。^① 为了解决教育学在中国的“水土不服”问题,中国教育学者试图使教育学“本土化”“中国化”。20 世纪 20 年代,国人就曾提出教育学中国化问题。至 20 世纪 50 年代,国人明确提出“教育学中国化”。一直以来,教育学中国化是中国教育学者追求和梦想,^②走“中国教育学”之路是中国教育学的旨归。^③ 改革开放之后,建设中国教育学在众命题和口号中脱颖而出,并走进了中国教育学人的研究视野。^④ 21 世纪初 20 年,中国教育学者在建设中国教育学的过程中,中国教育学的“中国性”“中国感”“中国味”进一步得到明确。^⑤

以学派形式建设中国教育学的努力正得到更多的认可。21 世纪以来,以“生命·实践”教育学派为代表的中国教育学派蓬勃发展。该学派坚持扎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直面当代鲜活的教育实践、胸怀人类世界的整体发展,对教育学的基本问题等做出了中国式的理解和贡献,在世界舞台上发出了教育学的中国之声与时代之声。

通过对 21 世纪初 20 年中国教育学建设进展的回顾,我们深深感受到,21 世纪中国教育学的建设,应以从中国出发的“大教育学”和“世界教育学”建设为根本追寻,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世界眼光、人类关怀的教育学。

（二）重视处理教育学学科体系中各分支学科之间的关系

教育学学科体系的构建是一个长期的任务。中国教育学各分支学科之间发展一直存在着不平衡的问题。21 世纪初的 20 年,中国教育学者进一步重视了教育学各分支学科关系的处理,不仅在已有的十个二级学科之下,新建了教师教育学、研究生教育学等学科,而且已有的二级学科也重视了各分支学科关系的处理。^⑥

当前,中国教育学学科建设者正在对教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教育学学科发展中的古今关系、中外关系、理论和实践关系等开展深入研究。教育学学科体系是教育学学科建设的重要方面,中国教育学者需要进一步重视教育学分类问题的研究,在“接着讲”^⑦的基础上走向“自己讲”,加强对教育学发展的合理性规划,优化教育学的学科体系,推动教育学从自然发展走向自觉建设,力求从根本上解决教育学的学科发展不平衡问题。

（三）重视处理教育学知识生产质与量之间的关系

教育学有一个社会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学术研究成果的出版和发表。21 世纪初 20 年,中国教育学者出版了大量著作和教材,发表了大量的期刊论文,教育学研究人员数量在急剧上升。中国教育学者越来越认识到需要做出与数量上升相符的实质贡献,越来越重视高质量教育学知识的生产。

①叶澜:《中国教育学发展世纪问题的审视》,《教育研究》2004 年第 7 期。

②侯怀银、王喜旺:《教育学中国化——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学者的探索与梦想》,《教育科学》2008 年第 6 期。

③侯怀银、王喜旺:《教育学中国化——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学者的探索与梦想》。

④郭建斌:《由“教育学中国化”到“中国的教育学”》,《现代教育科学》2017 年第 4 期。

⑤李政涛:《走向世界的中国教育学:目标、挑战与展望》,《教育研究》2018 年第 9 期。

⑥侯怀银、李艳莉:《21 世纪初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的探索》,《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4 年第 4 期。

⑦侯怀银:《中国教育学领域的“接着讲”》,《教育理论与实践》2009 年第 34 期。

然而,当我们面对体量庞大的教育学学术研究成果时,我们常常感叹中国教育学发展之快,但是具体分析部分研究成果的观点以及教育学的总体进展时,我们又感到教育学发展的不足。以教育学著作和教材为例,21 世纪初 20 年,国内研究者出版的教育学著作和教材的数量是庞大的,但内容体系高度相似,甚至雷同。以《教育学》《教育学基础》《教育学概论》《教育学原理》《教育原理》《教育基本理论》《教育概论》等命名的著作和教材为考察对象,我们发现这些不同名称的著作和教材涉及的基本上是教育学概述、教育概述、教育和社会、教育和人、教育目的、教育本质、教育制度、教师和学生、教学、课程、德育、体育、美育、智育等内容。中国教育学人应进一步思考如何对中国教育学的实质性发展做出贡献,如何为教育学知识的原创性积累增砖添瓦。

(四) 重视处理教育学研究和教育研究之间的关系

一个真正“好”的研究问题,无论对教育学理论发展或教育实践改善来说,还是对研究者自身发展来说,都应当是“真问题”。^① 我们需要确定好教育研究和教育学研究的界限。教育学是教育知识学科化的结果,教育知识是教育研究的结果,教育学人应该开展的是教育研究中的教育学研究,不断提升教育学研究中“学”的意味。

21 世纪以来,教育学研究者从“学”的层面开展教育学研究已经成为重要的研究趋势,教育学研究中问题意识和学科建设的反思意识显著增强。从教育研究到教育学研究,虽然只增加了“学”这个字,但是蕴含着深刻的内涵。教育研究关注的问题来自教育活动,而教育学研究关注的问题不但来自教育活动,而且来自学科理论发展和制度建设。我们虽然提倡在教育学研究中关注教育活动,避免无意义的思辨,但是绝不能以活动的研究代替学科的研究,两者必须进行严格区分。

三、21 世纪初 20 年我国教育学学科建设的展望

(一) 教育学的学科自主

所谓教育学的学科自主,即是教育学研究者创生教育学学科、教育学理论。经过数代中国教育学人的建设和发展,中国教育学单纯引进借鉴国外发展成果的时代已然过去,中国教育学的中国气息逐渐浓厚,独立创造的因子越来越多。我国拥有着悠久的历史,积淀着丰富的教育理论与教育思想,20 世纪教育学学科化的建设经验,独具特色的中国教育改革与实践,更是为我们建设中国教育学积累了丰富的养料。我们有理由坚信,未来中国教育学一定会在世界教育学科之林中有作为、有所贡献。这需要我们一代又一代中国教育学人的通力合作。在此过程中,我们不是完全拒绝吸收、借鉴国外教育学的研究成果,而是摆脱中国教育学建设过程中盲目拿来、亦步亦趋的情况。

第一,树立大教育学观,构建面向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大教育学。学校教育的研究是我国教育学需要持续研究和深耕的重要领域,我们需要加强对于学校教育内部规律的深层次研究,不断追寻、发现和揭示新时代背景下学校教育发展的普遍规律,通过高质量理论体系的构建,持续深入地指导我国学校教育实践。但是,教育学的发展如果仅以学校教育为研究对象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应改变传统的面向学校教育研究的教育学发展思路,在终身教育视野下,在深入研究学校教育的基础上,将教育学研究拓展至各级各类教育之中,延伸至人类教育活动其他形式之中,重视家庭教育学、社会教育学^②等学科的建设,探索终身教育学、社区教育学等学科建设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① 吴康宁:《教育研究应研究什么样的“问题”——兼谈“真”问题的判断标准》,《教育研究》2002 年第 11 期。

^② 侯怀银:《社会教育学学科建设初探》。

第二,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构建面向人类整体发展的教育学。我们的教育学应具有世界胸怀、人类关怀,将教育学研究层次提升至全人类发展问题的解答与解决之上。我们建设中国教育学,不是强调纯地缘性的学科建设,而是要从中国出发,拥有世界眼光,对人类教育发展一般性、普遍性原理进行探讨,这不仅是中国教育未来研究的必然,而且是中国教育学国际责任担当的表现。

第三,将教育学史作为教育学中的一门基础理论学科去建设。教育学的建设和发展应该是接着中国教育研究传统进行开拓性的建设。对此,开展教育学史的系统研究便是中国教育未来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21世纪以来,中国教育学史的研究基本上呈现出了全景关照的态势,研究者对中国教育史的学科性质、研究原则和方法等进行了深入思考,中国教育学史的研究正在逐渐发展。然而,对于西方教育学史而言,这方面的研究仍显薄弱。有鉴于此,中国教育学的建设要基于全球史的视角展开,我们不仅要注重中国教育学史的研究,而且要重视西方教育学史的研究,最终要能够整体把握和融通中西的全球教育学史。

（二）教育学的学科自立

教育学的学科自立,即坚持教育学独立的学术品质。20世纪中国教育学建设历程告诉我们,学科自立是教育学在整个学科体系中、在整个高校学科布局中拥有独立学科地位的前提和基础。

第一,加强教育学自身的建设和发展。新时代的教育学,应不断加快自身理论构建的步伐,以研究和探讨教育学自身独特的概念、范畴、体系等为突破口,不断加强自身理论建设的能力,在“学”的层面提升建设水平,以此推动教育学走向独立自主的学科发展道路。^①

第二,处理好教育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教育学是一门复杂的通学,这决定了教育学的发展需要多学科的视野。但是,教育学要想建立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独立性存在,就要正确认识教育学的这种学科交叉现象,^②在吸收借鉴其他学科成果的基础上,形成自身的话语表达,建立立足于教育学立场发展的中国教育学。

第三,从学科层面开展系统研究。从已有研究看,研究者对于教育学研究方法的探讨多集中于教育领域研究方法的探讨,从“学”的层面对教育学的研究方法进行探讨的仍较少。对于任何一门学科来说,从学科层面对学科的形成和发展进行研究,对推动学科建设有着重要意义,这不仅是学科理论自觉的重要表现,而且是推动学科发展的必要手段。我们要从学科本身出发,厘清教育学学科发展的基本问题,不断提升教育学“学”的水平。

（三）教育学的学科自尊

坚持教育学的学科自尊,即积极推动教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设。教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设是中国教育学学科建设的重要内容,更是实现中国教育学自我肯定和自我尊重的重要保障。

第一,推动教育学学科体系实现高质量的纵深发展。不同于20世纪中国教育学学科体系建设的任务,21世纪中国教育学学科体系建设要朝向高质量方向纵深发展。教育学在不断分化的过程中如何注意适当的综合、如何协调处理好教育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教育学与各分支学科之间的关系、教育学各分支学科之间的关系问题是新时代建设中国教育学必须予以回答的问题。这就需要我们z将教育学学科体系构建的思路从量的拓展转向质的提升,全面展开中国教育学学科体系的系统

^①张应强:《高等教育学的学科范式冲突与超越之路——兼谈高等教育学的再学科化问题》,《教育研究》2014年第12期。

^②吴刚:《学科想象与理论生长——兼论计算教育学的错觉》,《教育研究》2021年第3期。

研究,不断推动中国教育学科体系朝向高质量的方向发展。

第二,丰富并完善教育学学术体系。在建设教育学学科体系基础上推进教育学学术体系建设,应做好两方面工作:一方面,深入开展学术研究活动。不论是开展学术训练、生产学术知识,还是开展学术交流、进行学术评价,都是学术研究活动的内在要素,每一方面都应是教育学人予以重视的内容,只有在教育学领域形成良好教育学学术风气,使教育学人乐于、善于并享受教育学研究,才能不断创造高水平学术成果,推动教育学学科建设;另一方面,加速学术成果的出产和规范。21世纪初20年我国教育学的学术成果已令人瞩目,但在教材建设、学术著作编著、课题申请、学术期刊举办等方面仍需努力,尤其是要聚焦教育改革实践的重大问题,产出一批讲得好、用得上的学术成果。与此同时,要建立学术规范制度,使教育研究者能够时刻遵守学术道德。

第三,推动教育学中国话语体系的建设。只有建设好教育学的中国话语体系,提升教育学的中国话语权,才能彰显教育学的中国立场,实现自我尊重并获得国际尊重。教育学中国话语体系的建设应做好以下几项工作。首先,使中国教育学的理论建设者和中国教育的实践者共同成为中国教育学的言说者。要改变当前只由理论研究者发声的现状,由二者共同言说教育研究成果和教育改革实践成就,发出中国声音;其次,打造中国教育学的标识性概念。我们应聚焦中国教育实践,形成中国特色的教育学概念,将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学推广和传播出去;再次,积极主动传播学术研究成果。在传播中国特色教育学概念的同时,要将学术命题、学术观点、学术思想、学术理论同样进行推广和传播,言说好中国的学术研究成果,增强中国教育学成果的国际认知和认同;最后,丰富言说形式。综合运用文字语言、声音语言、图像语言、视频语言等多种媒介,多条路径并进,既使中国教育学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又能争取到教育学的中国话语权。

(四) 教育学的学科自强

教育学的学科自强主要从自身而言,是在教育学学科分化和综合的过程中形成的强大体系。而教育学学科自强的基础在于拥有逻辑严密的知识体系和理论体系。唯有如此,中国教育学在与其他学科、其他国别研究者对话的过程中,才会底气足,说话有分量。

第一,凝练中国特色,形成中国教育学的独特基因。中国教育学的形成和发展建基于中国悠久的历史,是由中国文化滋养成长起来的。这既是中国教育学的中国底蕴,又是中国教育学的中国底气。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入挖掘中国传统优秀文化,汲取中国传统教育的精髓,开发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寻求中国教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契合点,生成有中国特质的教育学基础理论和方法,形成新时代教育学的学术体系和学术话语。

第二,关注中国教育实践,确立中国教育学在中国教育实践中的地位。中国教育学必然要扎根中国教育实践,以中国教育实践为依据,解决中国教育实际问题。可以说,中国教育学的发展离不开中国教育实践这片沃土。中国教育学与中国教育实践之间的这种天然联系,要求我们以中国教育实践为目标开展中国教育学的理论研究,有的放矢,推进中国教育实践的高效发展,这是新时代中国教育学发展的必然趋势。

第三,关注时代发展需求,确立中国教育学在时代发展中的独特地位。中国教育学是开放共享、动态生成的教育学。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教育学有着不同的建设使命和任务。21世纪初20年,中国教育学人在构建中国教育学时面临了一些新的挑战,如中国的社会实践转型进入攻坚期,信息技术等发展为教育的日常生活提出了变革,科学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改变了学生的学习方式等。面临新的挑战,中国教育学需要紧扣时代发展步伐,对教育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做出反馈,以此不断加强教育学的现代性、创新性建设,摆脱学科建设的固有模式,构建具有新时代特征的中国教育学。

（五）教育学的学科自信

教育学的学科自信主要表现在教育学人的自信。教育学人的自信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在中国教育学与国外教育学的对话交流中,中国教育学人是自信的。中国教育学人在普遍性、一般性教育问题的研究方面,形成了一系列中国方案,并基于自身的思维逻辑与语言表达进行了中国式解答,为世界教育学的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在一些前沿话题、重大话题上,中国教育学人的研究深度能够与国外同步,甚至领先于世界研究水平。世界需要了解中国,需要中国教育学人走进世界教育学交流舞台的中心。随着一批批优秀中国教育学研究成果的外译,中国教育学的研究成果正在快步走向国外,中国教育学的学术影响力和国际贡献力也在显著提升。

在中国教育学与其他学科对话交流中,中国教育学人是自信的。百余年的发展,中国教育学的研究视野已不单局限于“教育”这一领域,而是拓展到人类社会发展的教育大思考。教育学在吸收借鉴其他学科研究成果的同时,也基于教育学立场对我国社会发展中涌现的诸多问题做出了教育学视角的解答。从这一角度看,中国教育学的存在不仅为各学科提供了新的研究领域,而且为各学科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知识和理论。

在中国教育学与教育实践的互动交流中,中国教育学人是自信的。21世纪以来,基于中国教育实践已生长出许多本土教育思想,为我国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教育学及其各分支学科,如教育经济学、教育管理、教育社会学^①等学科,通过知识转化、学科普及,在推动我国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等方面做出了教育学的独特贡献。从这一角度看,中国教育学人对教育实践的发展是有贡献度、有发言权的。

（六）教育学的学科自觉

教育学学科自觉是教育学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任何一门学科建设的目标都是为了自觉实现创新性建设和长远性发展,而不是对已有格局的简单承继或对现有规模的单一量化扩张。教育学学科建设,需要遵循知识生产和社会发展的双重逻辑,以人为本推动教育学从自在发展走向自觉建设。

第一,打造中国教育学高端智库。学科建设和智库建设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我们要加快中国教育学新型高端教育智库的建设,通过加强学术队伍建设、搭建学术平台、促进学术互动等途径融合各方资源,以国家和区域社会发展重大需求为重要导向,充分发挥其在理论研究、人才培养、政策制定和舆论引导等方面的功能。在打造高端智库、服务社会的同时,中国教育学也要基于社会发展的新需求,不断推动自身体系的完善和优化,建立起极具时代发展气息的中国教育学。

第二,推动中国教育学的普及。教育学的广泛传播和普及推广,将会推动教育学从“教师之学”到“人人之学”,从“大学之学”到“社会之学”。中国教育学的普及,将会摆脱教育学是一门学科教学法,或是象牙塔中一门学问的质疑,进而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对改革实践具有重要指导作用的学科,充分发挥教育学提升个人素养、服务社会的学科功能。做好中国教育学的普及工作,既需要政策制度的完善,又需要教育学普及形式内容的创新,还需终身学习社会氛围的营造。

第三,加强中国教育学派的构建。中国教育学派的出现,不仅是中国教育学建设的内在要求,而且是中国教育学争取学术话语权,提升学术影响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必然要求。我们应进一步培

^①王晋、侯怀银:《21世纪初教育社会学学科建设的原创性探索》,《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报》2013年第2期。

育中国教育学派,以学派的方式推动教育学的学科建设,通过各学派的学术传承,形成高效的、具有强凝聚力的学术研究共同体,产出持续稳定的高质量学术成果。从中国立场出发构建教育理论学说,并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其学说。同时,我们要积极吸收不同学科、不同国别、不同年龄的研究人员参与教育学研究,争取形成新的学术流派,以繁荣中国教育学的学术生态。

(责任编辑:蒋永华)

Disciplinary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Pedagogy in the First Two Decades of the 21st Century: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HOU Huaiyin

Abstract: In the first 20 years of the 21st century, the progress of the disciplinary construction of pedagogy in China wa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continuous enrichment and improvement of the discipline group of pedagogy,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the meta-research of pedagogy, the increased attention paid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pedagogical discourse system, and the close integration of the disciplinary construction of pedagog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The experience gained in the disciplinary construction of pedagogy in China was mainly manifested in the correct handling of the following four types of relationship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world in the proces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pedagogy;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he different branches of pedagog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quality and quantity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in pedagogy;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dagogy research and educational research. Rethinking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pedagogy in China, education academics still need to work hard to make progress. Specifically, we need to stick to the following six aspect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pedagogy: i. e., the disciplinary autonomy, independence, self-esteem, self-improvement, confidence, and consciousness of Chinese pedagogy.

Keywords: first two decades of the 21st century; Chinese pedagogy; disciplinary construction

About the author: HOU Huaiyin, PhD in Education and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of the Changjiang Scholars Program, is Professor and PhD Supervisor at School of Education Science and Director of Social Education Research Center, Shanxi University(Taiyuan 030006).